

郑伯奇

憶創造社及其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回憶與隨想文叢

憶創造社及其他

鄭伯奇著 鄭延順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二年·香港

書名 憶創造社及其他

作者 鄭伯奇

編者 鄭延順

責任編輯 湛言

封面題字 馬國權

裝幀設計 沙戈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一九八二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港幣十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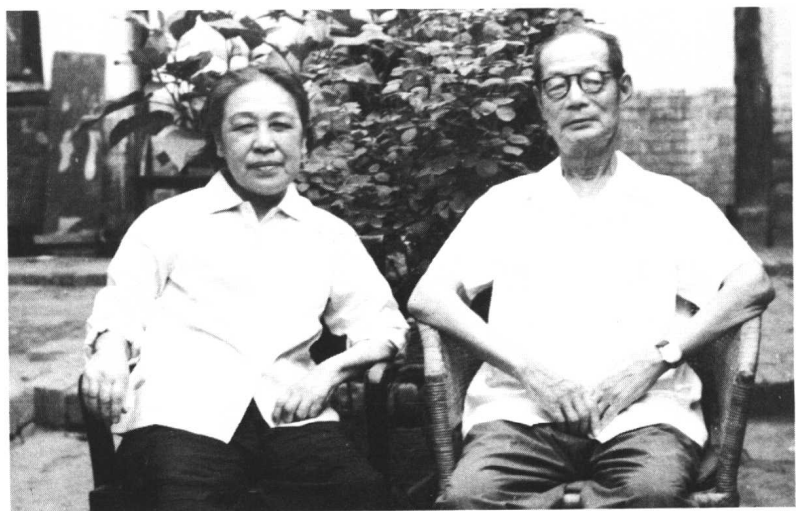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176-X



作者像（一九七七年十月攝於西安）



上圖 一九四一年與夫人及部份子女攝於四川巴縣歇馬場黃果樹下
下圖 一九四五年攝於西安



上圖 一九五三年攝於西安

下圖 一九七七年與夫人攝於西安家中

憶創造社

鄭伯奇

今年是五〇運動四十週年，而創造社被反動派非法封閉也恰有三十年。^(因此)當紀念偉大的五〇運動的時候，回忆一下創造社，~~例是非常合適的。~~例是非常合適的。

关于創造社，郭沫若同志的「創造十年」和「創造十年續編」是最直接而又最可靠的史料。他不仅忠实地敘述了創造社的历史事实，而且他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給創造社的活动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总结。

目 錄

憶創造社……………	一
創造社後期的文學活動……………	四
略談創造社的文學活動……………	七
創造社三題……………	八
回憶藝術劇社……………	九
「左聯」回憶片斷……………	二〇
「左聯」回憶散記……………	二五
不滅的印象……………	三六

魯迅先生的演講·····	一四七
最後的會面·····	一五一
回憶和學習·····	一五六
回憶瞿秋白烈士·····	一六一
悼聶耳先生·····	一六七
悼《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樸先生·····	一六九

即興主義的與即物主義的

——我的創作態度的一省察·····	一七三
《兩棲集》後記·····	一八一
魯迅靈前答客問·····	一八三
文壇生活二十五年·····	一八六
回憶辛亥革命前夕陝西的學生運動·····	一九〇
辛亥之秋·····	一九六

學生隊

——「辛亥之秋」續篇·····	三三
-----------------	----

附錄：鄭伯奇談創造社、「左聯」及其他·····	二四二
-------------------------	-----

編後記·····	鄭延順 二四九
----------	---------

憶創造社

關於創造社，郭沫若同志的《創造十年》和《創造十年續編》是最直接而又最可靠的史料。他不僅忠實地敘述了創造社的歷史事實，而且他還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給創造社的活動作了實事求是的歷史總結。但是他的敘述只到一九二六年去廣州參加北伐爲止。像他所說的：「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後，後期創造社的那一部份。」他認爲「讓仿吾、初梨、乃超來寫，更要適當一點。」這是很合理的。當創造社轉變之初，他被反動派追迫，不得不離開祖國：以後創造社的許多活動他沒有親自領導和參與。仿吾、初梨、乃超都是當時活動的中心人物，又都先後參加了黨。創造社轉變以後就接受了黨的領導，從黨的角度來看後期創造社的活動，認識、評價都會更加全面、正確。但是他們一直忙於其他重要工作，誰也沒有把這一段嚴重的鬥爭寫下來。而托派分子王獨清，在創造社非法被封以後，趁機大做文章，幸災樂禍，歪曲事實，挑撥離間，自我吹噓，妄想破壞革命文藝戰綫的團結，增加反動政治資本。在反動統治時期，由於政治環境，不便公開揭發，致使謬說流傳，真相蒙蔽，實可憤慨。事實上，後期創造社的許多糾紛，都是王

獨清在作祟。如今，太陽已經照耀天空，王獨清的鬼蜮伎倆必須揭穿，大是大非必須明辯。因為創造社的內部鬥爭也是我國革命文藝戰綫上兩條道路鬥爭的一部份。王獨清是我引進創造社的，他的情況我知道也較多，自覺責無旁貸。因此，去年《文藝月報》要我寫回憶創造社的文章，我就答應了。

我雖是創造社較早的成員之一，但前期的活動參加的很少。後期的活動雖然參加了，可是我不能從更高的角度去看問題。因此，關於創造社，只能結合着自己的經歷和體會來談，可能不全面也不深刻。就是這樣，當一開手寫起來，仍然遇到不少困難。譬如缺乏資料，以前的日記、信札，連同書籍雜誌一道，內遷的時候，留在上海，迄今毫無着落。其次，可以交談當時情況的老友多在遠方，見面不容易，通信也難詳盡。而記憶力又漸衰退，回憶也有困難。所以時寫時輟，久未完成，給《文藝月報》造成不少麻煩，深感抱歉。今當盛大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三十年前被敵人扼殺的創造社，更引起了我們的憶念。這篇文章，錯誤、遺漏，在所難免，以作紀念，實不相稱。有沫若同志的著作在前，殊難免「狗尾續貂」之謂；但對仿吾、初梨、乃超、彭康諸同志，期其能起「拋磚引玉」之用。我切望有關諸同志寫出更正確更全面的紀念文章來。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在偉大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所掀起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五四時代的文學藝術團體一般都帶有反帝反封建傾向。其中這種傾向表現的最鮮明、最尖銳、最強烈的要推創造社。

創造社的誕生，不用說也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但它和五四運動的這個主導團體却没有直接關係。它和當時最大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還曾發生過一段小小的誤會，一時形成了對峙的局面。至於資產階級文學團體「新月派」就把創造社看作眼中釘，不斷地加以造謠、侮蔑、分化、打擊，成為不可調和的敵對力量。因此，在較長時期，創造社處於孤軍奮鬥的形勢之中。這種形勢的造成不能看作人和人的關係，而是有比較錯綜複雜的原因。

創造社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間醞釀、發起、成立起來的。創造社成員的階級出身和生活環境對於他們的思想感情和創作傾向必然會發生一定的影響。一般來講，留日學生既不像留美學生那樣多屬於達官富商的子弟，也不像留法的勤工儉學生那樣經過勞動鍛煉，絕大多數是沒落地主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到日本留學無非利用少化錢

少跑路等便利條件來求得些新知識爲祖國效勞，可是冷酷的現實却給他們很大的刺激和教訓。自從甲午戰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日本帝國主義始終是中國人民的最直接最兇惡的敵人。日本政府對中國的各個方面的露骨的侵略行爲不斷地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而中國留日學生每次都站在這些反抗運動的前列。中國留日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從來是最敏銳最強烈的。同時，日本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得到迅速的發展。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想也在日本的工人階級和青年知識分子中間開展起來了。中國的留日學生，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又接受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觸發，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緒很快地高漲起來。創造社的反帝反封建傾向所以表現得特別鮮明、尖銳、強烈，和上述的這種環境大有關係。這和以胡適、徐志摩等留美學生爲首的新月派對比起來，就更加明顯。在創作方法上，創造社也和文學研究會所揭櫫的主張大不相同。一般人都稱創造社爲浪漫派。創造社的主要作家大都提倡浪漫主義或者追求自然主義以後的新流派，如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等。這是受了十九世紀末期歐洲文學思潮的影響，而當時日本文學界的新思潮也起了一定作用。十九世紀末葉，歐洲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文學就走上了反現實主義的道路，連自然主義也吃不開了，象徵主義、唯美主義、新浪漫主義

等新流派像雨後春筍一般簇生出來。日本由於大戰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結果，急驟地伍於帝國主義行列，日本文學界也得到相應的反映，小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文學突然衰頹下去，西歐所發生的各種新流派代之而興。創造社的主要成員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這種學習環境的影響。所以，惠特曼、王爾德、有島武郎等人的名字曾經屢屢出現在創造社作家的筆下。由此可見，並不是創造社硬要標新立異，打出浪漫主義的旗子，故意和國內其他文學團體鬧對立，而是這些作家的生活、學習環境造成的。應該承認，無論怎樣採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創造社作家的作品仍然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五四運動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動蕩情緒正需要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來反映，來表現。創造社的刊物和作品受到當時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大概就是這個緣故。這就說明了，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所以產生了浪漫主義是有一定的現實要求和時代背景的。

二

我參加創造社是由於郭沫若同志的引進，而我和沫若的結交乃是由於田漢同志的介紹。那時候，我和田漢同志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這是五四時期比較廣泛的青年

團體，我們都因爲同學的介紹而參加了。這個團體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國內各大學的學生和教員，在日本的會員很少。我們兩個素不相識，又分處兩地：一個在東京，一個在京都，見面的機會也不多。幸虧當時有一種風氣，素不相識的青年，只要是屬於一個團體或者有人介紹，便可以互相通信往來，成爲親密的朋友。我們既屬同一團體，又有共同朋友，也就這樣通起信來了。假期的時候，我到東京去看這位未見面的朋友。田漢同志非常熱情地招待我，真像久別重逢的故人一樣。他招待我去看當時剛剛上演的梅特林克的新劇《青鳥》，使我第一次接觸到歐洲最新的象徵主義藝術。這是東京的一羣文藝家組織的愛美劇團演出的，扮演姐姐和弟弟的中條八重子和夏川靜江，那時候還不過是十來歲的小姑娘，後來都成了大紅大紫的名演員。前些時候，看見夏川靜江在日本影片《混血兒》中扮演院長的那副溫厚的中年婦人的形象，不免使人回想起當年她演《青鳥》中小弟弟的情景。在田漢同志的引導下，我還親身欣賞了《咖啡店之夜》的真實場面。他給我介紹了李初梨兄弟和東京一些其他愛好文學的朋友。通過他，我還認識了日本當時進步學生團體「新人會」的幾個人物。但對我影響最大最深的是他介紹我認識的郭沫若同志。

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就在《三葉集》出版前後，壽昌——這是田漢同志的大號，當時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到京都來了。在先他曾寫信告訴我，遊覽東京以後，他要去福

岡訪問「沫若兄」的。我那時已很熟悉「沫若」這個名字。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那首《死的誘惑》，並且是通過日文翻譯的。因為當時日本報紙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他的那首短詩為例，譯成日文發表了。我覺得那首詩的情調、意境比當時許多詩人的名作要高超得多。以後我在國內的報刊上經常以敬佩的心情讀到他的作品。但對於他的身世，却一無所知。壽昌和他經常通信，討論文藝問題，這些書札已經編入《三葉集》了。雖然他們兩人也還沒見過面，可是書信往來，已經成為老朋友了。壽昌非常熱情地要給我介紹他的這位未見面的老朋友。他說，他的學名叫郭開貞，就在九州大學醫科讀書。啊，原來還是「大高同學」（日本學制，高等學校畢業升入帝國大學，在這一系統的不管是否同校學習，統稱大高同學），而且這個學名，我到日本不久，就聽人說過，說他是怎樣聰明好學，這樣一來，就覺得好像很容易接近了。我非常希望通過壽昌的介紹能夠認識他。

壽昌到京都以後，我們一道遊覽了嵐山和琵琶湖等名勝古迹，他很感興趣。在他的提議下，我們還訪問了廚川白村。當時廚川正以嶄新的文學評論家的姿態，批判自然主義文學，介紹西歐的新文學流派，在日本文壇上享有盛名。他的著作，像《現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等書都先後譯成中文，國內也很流行。我那時剛在高等學校一年